

生命意义感对高职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 希望的中介作用

江雅琴¹ 刘莎²

(1.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佛山 528137;

2.广州医科大学 卫生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36)

摘要:目的:探究生命意义感对高职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希望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式,利用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成人希望素质量表和社会幸福感量表对3165名高职生进行调查。结果:(1)高职生的生命意义感可以正向预测社会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得分从高到低的意义类型依次是高体验高寻求、高体验低寻求、低体验高寻求、低体验低寻求;(2)意义寻求通过希望对社会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意义体验通过希望对社会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3)意义寻求通过希望对社会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大于意义体验通过希望对社会幸福感的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生命意义感与高职生社会幸福感的关系,对寻找提升高职生社会幸福感的路径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命意义感;意义寻求;意义拥有;社会幸福感;希望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41(2023)02-0102-04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Hop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in Life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the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JIANG Ya-qin¹, LIU Sha²

(1. Foshan Polytechnic, Foshan 528137, China

2.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43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eaning in life on social well-being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ope. **Methods:** A total of 3165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chosen to engage in a survey research including Chinese Version of Meaning in Life Scale, Adult Hope Quality Scale as well as Social Well-Being Scale. **Results:** (1)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eaning in life can positively predict social well-being. The meaning types on social well-being score from high to low are high presence high search, high presence low search, low presence high search, low presence low search; (2) Search for meaning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social well-being through hope, and presence of meaning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social well-being through hop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arch for meaning through hop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resence of meaning through hope on social happiness. **Conclusion:** It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social well-being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hich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inding the way to improve the social well-being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Meaning in life; Search for meaning; Presence of meaning; Social well-being; Hope

收稿日期:2023-01-05

基金项目:2021年度广东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项目“混合式教学环境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体验式教学模式探索研究”(2021GXSZ192);2021年度广东省教育厅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家校社协同育人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模式研究”(2021WQNCX214)。

第一作者简介:江雅琴(1990—),女,湖南湘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幸福感是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1]。从成分来说,幸福感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有机整合,与个体的情绪情感、社会适应等心理健康要素紧密相关^[2]。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较多,对社会幸福感的研究相对较少。社

会幸福感最早由美国学者 Keyes 提出,指的是个体对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及对其生活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3],包括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社会贡献、社会实现以及社会和谐五个维度。社会幸福感关注个体的社会联系与社会任务,强调个体与社会的融合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从社会幸福感的视角而言,一个有序稳定、公平正义、运行良好的社会能有效提高人的社会幸福感,从而提高人的心理健康水平^[4],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5]。

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由来已久,目前引用较广的概念来自 Steger (2006),Steger 从意义寻求 (search for meaning, 又译“意义寻找”) 和意义体验 (presence of meaning, 又译“意义存在、意义拥有”) 两个维度对生命意义感进行了划分。意义寻求指的是个体主动寻求生命意义的程度,强调的是过程;意义体验指的是个体体验到和感受到生命存在意义的程度,强调的是结果^[6]。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探索与研究^{[7][8]}。国外一些研究倾向于认为意义体验与主观幸福感、积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意义寻求则与主观幸福感、积极情绪呈负相关,甚至可能导致心理困扰和消极后果^[9]。但也有研究发现,意义体验和对意义寻求均可能有助于有效降低个体的自杀风险,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0]。另有研究进一步发现,只有在那些已经在生活中拥有实质性意义的青少年中,意义寻求与幸福感才是呈正相关的^[11]。对国内样本的元分析发现,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和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意义存在、意义寻求均与主观幸福感和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感呈负相关但不显著^[12]。由此可以看出,意义体验对幸福感的积极预测作用已经得到一致的认定,分歧点在于意义寻求给幸福感带来的影响是正面促进作用还是负面削弱作用。因此,生命意义感可能会对社会幸福感产生预测作用,但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对国内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是否一致,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希望与生命意义感均对个体的幸福感有重要的作用^{[13][14]}。在以往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中,希望常常充当一个中介变量的作用,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15]。在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中,希望可能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作为积极心理资本的一个核心成分^[16],希望由两部分组成,即途径思维 (pathways thinking) 和意愿动力 (agency thinking)^[17]。可以说,希望是一种情绪智力,既可以为个体提供实施计划的动力,又能提供实现这个计划的行动途径^[18]。一方面,希望受到生命意义感的影响,生命意

义感的两个维度都能提升希望感。其中,在意义寻找的过程中,个体将体验到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希望感获得增强;意义体验则推动个体建立向目标前进的自我信念系统,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希望^[19]。另一方面,希望也能预测社会幸福感,希望的路径思维和意愿动力维度均与大学生的社会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20],个体越是对自身、对他人以及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充满希望,其感受到的社会幸福感水平也越高,提升个体对未来的希望,能有效增强个体的幸福感^[21]。

综上所述,既往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希望和社会幸福感两两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目前鲜有研究探讨希望在生命意义感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旨在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验证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希望和社会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并考察希望在生命意义感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和谐社会和幸福社会的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研究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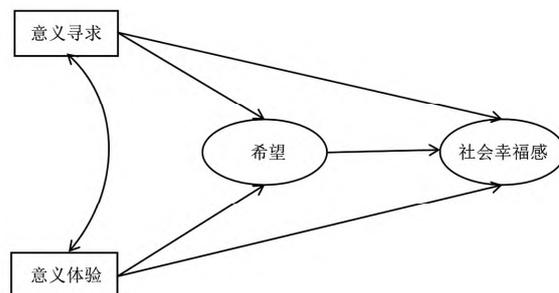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图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方便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抽取两所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3 165 份。其中男生 1 253 人 (39.59%),女生 1 912 人 (60.41%);大一 1 814 人 (57.31%),大二 767 人 (24.23%),大三 584 人 (18.45%);独生子女 522 人 (16.49%),非独生子女 2 643 人 (83.51%)。

1.2 研究工具

1.2.1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

采用由 Steger 等 (2006) 编制^[6]、王鑫强等 (2016) 修订^[22]的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 (MLQ-C),分为意义寻求 (MLQ-S) 和意义体验 (MLQ-P) 2 个分量表,分量表各 5 个题项,量表采用 7 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7 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强。本研究中总量表和 2 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0、0.89、0.89。

1.2.2 成人希望素质量表

采用 Snyder (1995) 编制^[17]、陈灿锐等 (2009) 修

订^[23]的成人希望特质量表,该量表包含途径思维和意愿动力2个维度,共有12个题项,其中有4个题项不计分数,1个题项反向计分。量表采用4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4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希望感越强。本研究中总量表和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为0.87、0.80、0.78。

1.2.3 社会幸福感量表

采用Keyes等(2004)编制^[3]、苗元江等(2009)修订^[24]的中文版社会幸福感量表,量表包含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社会整合、社会认同和社会贡献5个维度,共15个题项。量表采用7级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7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会幸福感越强。本研究中总量表和5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为0.91、0.91、0.72、0.81、0.76、0.92。

1.3 数据分析

回收问卷后,使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使用Amo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建构模型,运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 $p < 0.05$ 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将生命意义感量表、成人希望素质量表和社会幸福感量表的所有项目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共有7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且第一个公共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3.38%,低于40%的临界值,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变量间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并不严重。

2.2 生命意义感、希望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相关

对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希望与社会幸福感4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见表1),结果发现,意义寻求、意义体验、希望与社会幸福感4个变量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 0.40-0.62$, $p < 0.001$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意义寻求的平均值(24.70 ± 5.03)非常显著地高于意义体验的平均值(23.23 ± 5.36) $p < 0.001$ 。

表3 不同类型的生命意义感在社会幸福感总分及其维度的平均数差异比较

	社会幸福感 <i>M</i> ± <i>SD</i>	社会实现 <i>M</i> ± <i>SD</i>	社会和谐 <i>M</i> ± <i>SD</i>	社会整合 <i>M</i> ± <i>SD</i>	社会认同 <i>M</i> ± <i>SD</i>	社会贡献 <i>M</i> ± <i>SD</i>
低体验低寻求(<i>n</i> =1 323)	65.29±11.34	16.29±3.50	10.99±3.18	12.17±2.99	13.31±2.88	12.54±2.88
低体验高寻求(<i>n</i> =514)	69.11±12.08	17.12±3.31	11.27±3.49	13.09±3.54	14.39±3.12	13.25±3.33
高体验低寻求(<i>n</i> =292)	75.40±10.82	18.12±2.81	12.46±3.19	14.54±2.97	15.42±2.87	14.85±3.02
高体验高寻求(<i>n</i> =1 036)	80.89±12.05	18.85±2.62	13.66±3.69	15.59±3.28	16.44±3.01	16.35±3.27
<i>F</i>	366.12***	137.54***	130.04***	237.47***	223.43***	311.47***

表1 高职生意义寻求、意义体验、希望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相关

	<i>M</i> ± <i>SD</i>	意义寻求	意义体验	希望
意义寻求	24.70±5.03	-		
意义体验	23.23±5.36	0.51***	-	
希望	22.23±5.36	0.40***	0.62***	-
社会幸福感	71.95±13.52	0.45***	0.60***	0.57***

注:***表述 $p < 0.001$,下同。

2.3 生命意义感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

为检验生命意义感对高职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以生命意义感各个维度为自变量,以社会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知,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均对社会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共预测了社会幸福感总变异量的39%。

表2 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对社会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N*=3 165)

因变量	预测变量	调整 <i>R</i> ²	<i>F</i>	<i>Beta</i>	<i>t</i>
社会幸福感	意义体验	0.36	1 771.17***	0.60	42.09***
	意义寻求	0.39	135.20***	0.19	11.63***

为进一步探讨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按意义寻求得分将被调查者划分为高寻求组(得分高于平均数)和低寻求组(得分低于平均数),按意义体验得分将被调查者划分为高体验组(得分高于平均数)和低体验组(得分低于平均数),一共得到4种组合的生命意义感类型,即高体验高寻求、高体验低寻求、低体验高寻求、低体验低寻求^[25]。方差分析显示,4种生命意义感类型在社会幸福感及其各个维度上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 < 0.001$)(见表2)。其中,高体验高寻求的社会幸福感得分最高,其次是高体验低寻求、低体验高寻求,分数最低是低体验低寻求。事后检验表明,4种类型的生命意义感在社会幸福感的差异均非常显著($p < 0.001$)。

2.4 希望在生命意义感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文献综述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中介模型来检验希望在高职生生命意义感各维度与社会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chi^2/df = 14.61$,RMSEA = 0.03, GFI = 0.98, AGFI = 0.95, NFI = 0.97, IFI = 0.98, TLI = 0.96, CFI = 0.98, SRMR = 0.07(见图2),拟合指标较为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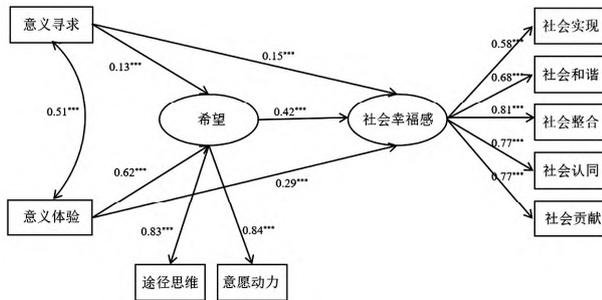


图2 希望在意义寻求、意义体验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验,抽样次数为 5 000 次。控制性别变量和年级变量后,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见表4)表明“意义寻求→希望→社会幸福感”路径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意义体验→希望→社会幸福感”路径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验证了希望分别在意义寻求、意义体验与社会幸福感间的中介效应。因此,生命意义感、希望和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统支持中介效应模型。其中,意义寻求对社会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是 0.70,占总效应(1.20)的 58.33%;间接效应是 0.50,占总效应的 41.67%。意义体验对社会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是 1.00,占总效应(1.51)的 66.22%;间接效应是 0.51,占总效应的 33.77%。

表4 希望的中介效应

路径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L
意义寻求→希望→社会幸福感	0.50	0.03	0.44	0.57
意义体验→希望→社会幸福感	0.51	0.04	0.44	0.58

3 讨论

3.1 生命意义感及其各维度对高职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把生命意义感的 2 个维度作为社会幸福感的预测变量,构建了意义寻求、意义体验与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回归模型,探讨生命意义感的 2 个维度分别对社会幸福感的作用。结果表明,意义寻求、意义体验均与社会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与国内大多数研究一致^[12]。国外有研究者认为,因为意义

寻求过程中有时候会受挫,伴随着对生命的困惑,体验到痛苦等负面情绪,所以意义寻求会负向预测幸福感^[26]。国内研究者则发现,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持有的是积极进取的心态,因此意义寻求与积极情绪、幸福感、心理健康呈正相关^[22]。大学生对生命意义感的寻求和体验越多,越会激发亲社会行为的内部动机^[27],更能感受到社会的和谐与整合,对社会的认同和贡献也越高,能够产生更高的社会幸福感。

对生命意义感不同类型的社会幸福感得分进行比较时发现,社会幸福感得分从高到低的意义类型依次是高体验高寻求、高体验低寻求、低体验高寻求、低体验低寻求。也就是说,如果高职生已经体验到生命意义与价值,并且还在积极思考、追寻生命意义,其感受到的社会幸福感最强烈;其次是虽然很少探寻生命意义这类话题,但是很清楚自己生命的意义、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高职生;再次是尚未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却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的高职生;社会幸福感最低的则是既不知道也不想去探索自己活着的意义的高职生。因此,虽然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都能正向预测社会幸福感,但意义体验对个体获得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大于意义寻求。与意义寻求相比,意义体验能调节生活压力 and 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更能代表高职生心理健康水平^[28],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研究还发现,处于探索人生价值重要阶段的高职生,意义寻求的得分显著高于意义体验。值得警惕的是,当意义寻求较高时,意义体验的保护作用有可能受到意义寻求的抑制而变得不显著^[29]。

综上,欲提高高职生的社会幸福感水平,需要努力促使高职生多一些对于生命的思考与反思,学校和社会也可以提供一些生命教育课,帮助高职生寻求生命意义,体验到生命价值^[30]。同时,研究也提示,教育工作者在对高职生进行生命教育时,要综合考虑意义寻求与意义拥有 2 个维度,针对 4 种不同意义类型的学生分别给予指导;既要注重引导高职生主动探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又要帮助高职生找到意义体验的方法,而且还要特别重视意义体验的积极作用,不能仅仅鼓励高职生去寻找生活的意义。

3.2 希望的中介作用

以希望为中介,建构生命意义感影响社会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意义寻求既可直接影响社会幸福感,同时也可通过希望间接影响社会幸福感水平;意义体验既可直接影响社会幸福感,同时也可通过希望间接影响社会幸福感水平。这

表明,生命意义感通过希望对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符合中介效应模型。

意义寻求、意义体验与希望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会影响希望感的高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19]。生命意义感越强的个体,会努力追求自己的生命价值,也更能经常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对人生有更积极的认知,希望感水平也越高;相反,如果高职生很少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很少体验到活着的意义,就容易丧失对生活的希望感。

中介效应模型表明,生命意义感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体的社会幸福感,还可以通过希望间接对社会幸福感产生影响。生命意义感高的个体,希望感也会更高^[32],而希望感的高个体有较强的实现预期目标的动力,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有效的路径实现目标,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其感受到的社会幸福感水平也会随之提升,这与姚若松等人的研究基本一致^{[20][21]}。

对中介效应值的比较结果表明,意义寻求通过希望影响社会幸福感的中介效应高于意义体验通过希望影响社会幸福感的中介效应。这进一步揭示,相比意义寻求,意义体验可以更充分地预测社会幸福感;当意义寻求较低时,保持较高的希望能为大学生的社会幸福感提供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对于尚未体验到生命意义还在努力追寻生命意义的高职生,要让他们保持一种希望感,树立对未来的目标,并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有效的途径,实现预期目标。

4 结论

(1) 高职生的生命意义感可以正向预测社会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得分从高到低依次的意义类型分别是高体验高寻求、高体验低寻求、低体验高寻求、低体验低寻求。

(2) 意义寻求和意义体验对高职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均可通过希望这个中介变量实现,且意义寻求通过希望影响社会幸福感的中介效应高于意义体验通过希望影响社会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2).
- [2] 俞国良.心理健康的新诠释:幸福感视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72-81.
- [3] Keyes C L M & Shapiro A. Social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 How Healthy Are We? A National Study of Well-

Being at Midlif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350-372.

- [4] Salehi A, Marzban M, Soroush M, et al. Social well-being and related factors in students of school of nursing and midwife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Based Nursing & Midwifery, 2017, 5(1): 82-90.
- [5] 陈浩彬, 苗元江.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J]. 心理研究, 2012, 5(4): 46-52.
- [6] Steger M F, Frazier P, Oishi S, et al.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6, 53(1): 80-93.
- [7] 李占宏, 赵梦娇, 刘慧瀛, 等. 生命意义寻求的原因: 成长抑或危机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12): 2192-2203.
- [8] Li J B, Dou K, Liang 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ence of Meaning, Search for Mean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Based on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21(22): 467-489.
- [9] Cohen K, Cairns D. Is Searching for Meaning in Lif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firmation and Possible Moderators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2): 313-331.
- [10] Costanza A, Prelati M, Pompili M. The Meaning in Life in Suicidal Patients: The Presence and the Search for Constructs. A Systematic Review [J]. Medicina (Kaunas), 2019, 55(8): 465.
- [11] Krok, Dariusz. When is Meaning in Life Most Beneficial to Young People? Styles of Meaning in Life and Well-Being Among Late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018, 25(2): 96-106.
- [12] 靳宇倡, 何明成, 李俊一. 生命意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基于中国样本的元分析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6, 24(12): 1854-1863.
- [13] Shiri S, Wexler I, Marmor A, et al. Hospice Care: Hope and Meaning in Life Mediat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Staff [J].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Medicine, 2020, 37(10): 785-790.
- [14] 谢其利, 宛蓉, 兰文杰. 夫妻依恋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希望和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38

- (6): 107-114.
- [15] 范志光,袁群明,门瑞雪.知觉压力、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希望的中介作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0,40(23):5 074-5 077.
- [16] 熊俊梅,海曼,黄飞,等.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资本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36(1):94-102.
- [17] Snyder C R. 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nurturing hope[J].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5, 73(3): 355-340.
- [18] 肖倩,吕厚超,华生旭.希望和乐观:两种未来指向的积极预期[J].心理科学,2013,36(6):1 504-1 509.
- [19] 程建伟,杨瑞东,郭凯迪,等.家庭功能对高职大学生希望的促进:生命意义存在与意义寻找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3):577-581.
- [20] 姚若松,郭梦诗.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希望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探新,2018,38(2):164-170.
- [21] 姚若松,郭梦诗,叶浩生.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社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希望与孤独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报,2018,50(10):1 151-1 158.
- [22] 王鑫强,游雅媛,张大均.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大学生中的信效度及与心理素质的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8(10):161-167.
- [23] 陈灿锐,申荷永,李浙琮.成人素质希望量表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1):24-26.
- [24] 苗元江,王青华.大学生社会幸福感调查研究[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30(4):76-81.
- [25] 朱海腾,姚小雪.大学新生的人生意义与抑郁:交互效应与中介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4):475-484.
- [26] Steger M F, Kawabata Y, Shimai S, et al. The meaningful life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vels and correlates of meaning in life[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8, 42(3): 660-678.
- [27] 刘群,赵峰,张姝玥.相生相成:拥有生命意义与亲社会行为相互关系的纵向研究[J].心理科学,2020,43(6):1 438-1 445.
- [28] Ji, Young, Paik, et al. The Influence of Life Stress on Well-being: Meaning in life as Moderator[J]. Kore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4, 33(3): 509-531.
- [29] 傅俏俏.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影响:智能手机成瘾的中介作用[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2,24(3):115-121.
- [30] 黄晓佳,郝鑫,陈昕苑,等.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的研究进展[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12):1 900-1 905.
- [31] HyunSim, Song, SeoungYun, et al. The Effect of the Search for Meaning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Undergraduates and Middle - Aged Adults : Verification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Hope and Presence of Meaning[J]. The Korea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2017, 29(3): 843-870.

责任编辑:李增华

(上接第41页)

- [10] 纪颖,黄华明,颜瑞婷,等.“建阳桔柚”果皮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工艺及其稳定性研究[J].热带作物学报,2017,38(10):1 940-1 946.
- [11] 刘源.脂肪酸酯/正丙醇/水无表面活性剂微乳液的研究[D].青岛:青岛科技大学,2016.
- [12] 付中民,刘伟,杨文超,等.山茶蜂花粉粗多糖的脱蛋白研究[J].蜜蜂杂志,2009,29(3):3-5.
- [13] 蓝峻峰,廖政达,谢济运,等.复合酶在叶下珠有效成分提取中的应用[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5):15 254-15 255+15 257.
- [14] 齐欣欣.假酸浆多糖的提取纯化及纯度鉴定的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
- [15] 杨辉.茶油提取新工艺及其品质的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2.
- [16] 张奕婷,赵桐,于波.微波超声波辅助提取诃子多糖的工艺优化[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8,38(6):111-115.
- [17] 陈向明.柴达木盆地地骨皮活性成分分析方法与含量研究[D].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2014.
- [18] 刘红红.真姬菇 SK-01 胞外多糖与胞内多糖的提取及其抗氧化活性[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3.

责任编辑:富春凯